

1007

第十辑

儀徵文史
資料



仪征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仪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编 者 的 话

《仪征文史资料》创刊于1984年。十余年来，荜路蓝缕，艰辛备尝，今天，第十辑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谨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政协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

《仪征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为保存地方史料，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其他部门和刊物难以替代的作用。今后，我们将根据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要求，继续努力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同时，热诚希望历届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政协文史工作，并踊跃赐稿。兹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仪征文史资料》征集本市政治、军事、经济、工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民族宗教、民俗风情、侨务等方面史料。史料的时限：上自戊戌变法（1898年）始，下至目前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史料尤为欢迎。

二、撰写史料应以“亲闻、亲历、亲见”为原则，忠于史实。采访当事人所写成的史料，同样欢迎。

三、来稿请用方格稿纸书写，字迹须清楚、规范，所引资料请注明出处，请写明作者详细住址。

四、本委员会有权对稿件作删改，如作者不同意，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不论用否均不退回，请作者自留底稿。

五、稿件一经录用，酌致薄酬。

六、稿件请寄仪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仪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目 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在抗日烽火中	魏然	1
●人物春秋		
忆高崧	陈淑芳	30
风雨编辑路	高红微	34
永难忘却的纪念 ——追忆好友高崧同志	胡企林	
	郑海天	40
回忆父亲二三事	高斯坦	56
书苑留香 魂归故土 ——悼念窗友高崧同志	高恕新	60
难忘的恩师高崧先生	吕明志	64
一位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张澜庆生平事略

张沛庆

汤杰 68

笔耕不倦育后学 八百万字献衷怀

——江厚祺教授事略

程玉田 80

著名银行家卞白眉在天津的二十年

刘续亨 90

艰苦奋斗办教育 呕心沥血育人才

——李录奇生平事略

孙怀宝 100

●往事追忆

从军五十年

张纯青 118

山区明珠——月塘水库

薛干臣 132

仪征救济院的演变

刘武臣 142

民国时期江都同仪征的

一场边界纠纷

刘武臣 146

●文化体育

浑穆稳健，渊雅灵动

——吴让之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林云志 148

吴让之寓泰轶事

陈子伟 160

记解放后仪征首届体育运动大会

孙怀宝 162

记参加首届泰州专区运动会	孙怀宝	166
抗战时期十二圩的革命文化活动	沈 捷	
	朱家斌	169
●乡镇篇		
千古风流话胥浦	孙庆飞	174
●名特产谱		
雨花石	李名荣	182
●小资料		
仪征的全国之最	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86
仪征历史上的第一	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2
●唐赤峰遗诗	唐赤峰	19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在抗日烽火中

魏 然

编者按：仪征革命前辈魏然，近几年对自己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认真进行回顾，陆续写下了10多万字的回忆录《风雨航程》（初稿）。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征得魏老同意，选载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仪征人民抗日斗争的一段历史回忆，作为对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由于受篇幅限制，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文字作了删节。正在本书付梓过程中，魏然同志不幸于10月12日病逝。我们对魏老表示深切的悼念。

（一）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年12月，南京、扬州以及仪征县城相继沦陷。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仪征城乡人民同仇敌忾，自发地与侵略者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原来仓皇撤退的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也于1938年三、四月间，在月塘建立敌后政权。

这一时期，我在天长县以及天长和仪征边境的农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天长县行知学社和读书会、江都县抗日锄奸团，组织苏皖边区抗日义勇军等。虽然这些活动都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还是周元冰、徐速之接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的指示回来办的，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缺少党的直接领导，犹如航行在大海中的航船缺少舵手一样。我们盼望党早日到来后来，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39年5月，中共苏皖省委派方毅同志为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和朱绍卿营长率领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纵队一个营以及战地服务团挺进到津浦路以东盱眙、嘉山、来安、天长等县进行侦察活动，宣传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周元冰在天长张公铺见到朱绍卿，以天长青年救国会的名义向朱介绍了救国会的组织形式、理事名单、开展活动及其活动范围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介绍了天长、六合、仪征等县日伪军和国民党的军政现状，以及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和各种反动势力。中共苏皖省委在基本掌握了津浦路东情况后，于这年7月决定成立路东工作委员会，以李世农为书记，与新四军五支队第八团一同开进津浦路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此时，党组织也派周利人到天长县，与陈舜仪等联系，秘密开展地下党的活动，建立地下党组织天长县工委，兼管仪征、扬州的工作。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和一些主要骨干都先后入了党。周利人还在天长县杨村秘密办农民训练班，发展了部分农民党员。我也在当年9月份经周利人、陈舜仪介绍并由陈代填表加入党组织，成为仪征本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我入党时虽然填了表，但没有来得及举行宣誓仪式。这年11月新四军苏皖支队进入仪征，当时的中共苏北特委派周

爱民随军开展民运工作，在陈集建立中共仪征县委，周爱民任县委书记。陈舜仪经苏皖省委同意到仪征与周爱民联系，共同开展仪征的抗日斗争，我被介绍到仪征县委，周爱民、陈舜仪在我的家中为我补行入党宣誓仪式，周爱民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并代表仪征县委讲话。我的后补期本为一年，1940年4月即提前转正，从此我在党的指引下走上职业革命道路，在党的怀抱里不断成长。

我在天长加入党组织后，党组织布置我的任务就是开展仪征的工作。当时，新四军苏皖支队还没有到达仪征，仪征国民党敌后县政府还在月塘，县长是黄家驹。黄家驹还是要抗日的，但他的政府是靠仪征县城一批绅商支撑的，这批人把持了民政、税务等部门，又分别组织县常备队、行动队、锄奸团等武装，收捐收税，抗日并不积极。天长县工委周利人、陈舜仪决定利用亲戚、熟人关系派部分人到黄家驹的县政府去，分别掌管武装、财政和宣传，把国民党仪征县政府逐步改造成抗日的政府。派去的人有董筱川、陈仁刚、高昭苏、曹连生、曾得利、陈金元和我等。董筱川是黄家驹的亲戚、长辈，又是祖传田赋征收处的帐房先生，也是天长青年爱国运动的支持者，到黄家驹县政府当县金库主任和总帐会计，我和陈仁刚、高昭苏等人到县常备队。我组织了一个分队的人枪，与原县政府的一个分队，和由伪军反正过来的一个分队，组成第一大队的第一中队，高昭苏当第一大队副队长，我当一分队队长，后陈仁刚继任，章天民当三分队队长，二分队队长是上面派的。我后来当中队长。我们开始是由中共天长县党组织派进并领导的，苏皖支队进入仪征成立中共仪征县委以后，我们主要受中共仪征县委领导，但中共天长县委也与我们保持领导关系，两个县委确定我们这批人

的方针是：利用合法，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然而我毕竟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受党组织指派来的，大都是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因此我们这一中队严格军政训练，经常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共合作抗日等歌曲，与黄家驹县政府中妥协投降势力矛盾十分尖锐。我曾经以武装包围县政府，以“兵谏”的方法要黄家驹整顿县政府，不害民，不妥协，真抗日。我们还将与政府投降势力有勾结的汉奸、仪征商会会长李雨春抓来，揭露有些人与日伪互相勾结的阴谋。当日军进攻县政府所在地月塘时，和伪方有默契的投降势力早听到消息撤退了，只有我们中队奋起抗击日军。黄家驹处于两难境地，既得罪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的武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没有真正的武装力量与我们相抗衡，同时他有一定的爱国意识，有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向，但又离不开他原来的一班人，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有一定的社会势力，且相互联姻，盘根错节，是旧政权的基础，离开这些人就保不住位置，加之又受到国民党省政府顽固派的压力。

我们虽然高举抗日旗帜，不愿与妥协投降势力同流合污，但又要避免与黄家驹闹翻，因为要执行党组织的利用合法，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从当时皖东的抗日斗争形势看，虽然经过新四军五支队、苏皖支队努力奋斗，初步打开了抗日斗争局面，但是由于受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顾虑破坏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斗争也不够坚决，结果我们处境相当困难。这种状况，在刘少奇到淮南后才得到改变。1939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率中原局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淮南地区的抗日斗争。1940年一、二月间，刘

少奇接连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评统战中的右倾思想，坚持统战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敢于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进行坚决斗争，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中央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讲话传达贯彻以后，形势很快得到改变。

1940年3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个团向津浦路东新四军五支队后方半集进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调集10个团向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驻地藕塘进攻，企图迫使新四军四、五支队回到江南。刘少奇领导和布置反磨擦斗争，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苏皖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等协同作战，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和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在国民党顽固派大举向我进攻的时候，国民党驻仪征县的江苏省防军十六团及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中反共顽固势力，气焰十分嚣张，蠢蠢欲动。这时中共仪征县委常随苏皖支队在六合、天长农村活动，我们在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又接不到中共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不知应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采取什么行动。为此，陈舜仪决定由他和我分头去找仪征县委。陈舜仪是共产党员，在天长群众中很有威信。1939年国民党天长县长邀请他当铜城区区长，他利用合法身份组建半脱产后备队、动委会工作团和抗日统战组织。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陈舜仪被天长县长撤了职，并被通缉查办。陈就转移到仪征，与我一起工作。因为我们在仪征已经比较“红”，董筱川建议我和陈舜仪不要一道走，以防止引起政府内反共顽固派和十六团的注意。所以，陈舜仪先走，向六合方向，很快找到了中共仪征县委书记周爱民。我向天长方向走，当晚没有赶到目的地。其时，苏皖

支队已奉命反磨擦，解决驻仪征十六团部分武装和仪征县政府的零星武装，并要我们一中队拉出驻地以外，配合行动。陈舜仪从周爱民处得到这个消息后连夜赶到月塘集以西的董筱川住处，要董立即派曾得利、陈金元送信到我的一中队。当时我已到天长方向去找中共仪征县委，不在中队，而十六团又有两个新兵连在一中队驻地附近派有岗哨，曾、陈两人黑夜里没有找到一中队驻地，一中队未能及时拉出来配合苏皖支队行动。在这同时，陈舜仪又要董筱川带他亲自去见黄家驹，向黄转达中共仪征县委的意见，动员黄留下来仍当县长。董筱川怕黄家驹不同意，又怕黄将陈舜仪扣留，犹豫不决，拖延了时间。而苏皖支队向十六团进攻已经开始。苏皖支队对当地地形不太熟悉，月塘西面又是丘陵山地，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人员和常备队，以及十六团的部分武装，分散住在大小十几个村庄，纵横近十里，所以苏皖支队进攻时形不成包围圈，加之没有一中队配合，因而未达到预定目的，只遇上常备一大队直属的一个机炮排，缴了两门迫击炮，天亮后撤出战斗。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及武装各部都退到六合境内。陈仁刚、高昭苏知道我和陈舜仪找中共仪征县委去了，又没有接到曾、陈通报的消息，他们听到枪声，以为是日军偷袭扫荡，所以将一中队向西撤退；等他们知道是苏皖支队进攻的，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于是，就跑回家了。一中队由三分队队长章天民负责。

当天，周爱民、陈舜仪到天长谕兴集找到我，一同到我家说明情况，决定将一中队找回来。于是，我带警卫员余保安到六合八百桥附近。我已不便回到一中队去，因为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中的反共派对我和陈舜仪均产生怀疑，所以叫余保安潜回一中队悄悄地将章天民找出来，给了章一笔钱和苏

皖支队的通行介绍信，要他伺机将一中队拉出来。谁知，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和十六团已十分防范：行军时将一中队放在中间，驻扎时一中队周围都部署他们的部队，同时，还将章天民调到大队当副官，另派他们的亲信为中队长。然而，一中队毕竟是我们共产党帮助组建起来的，其中虽然只有我一名党员，但骨干和多数士兵是爱国青年，他们坚决抗日，倾向共产党，他们中多数人时刻都想到共产党、新四军这边来。就在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和十六团向北撤退途中，过三河蒋坝时，我的警卫员余保安带回一个班。个把月后，即1940年5月，新四军五支队开辟淮宝（淮阴、宝应运河以东部分地区，共产党建立淮宝县）时，章天民又率队起义到了五支队。章后来任五支队（后为新四军二师五旅）教导队长。国民党仪征县常备队一中队最后还是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里。

这次苏皖支队对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及十六团的反磨擦斗争，赶走了驻扎在月塘大李洼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及其常备队同时瓦解，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陈舜仪被中共天长县委派缪文渭从仪征接回去，当上了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在积极筹建。

（二）

1940年4月，津浦路东八县均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仪征县委原打算留黄家驹当县长，因董筱川有顾虑没有来得及与黄谈判，黄跟十六团走了。县委书记周爱民在筹建仪征县政府时，开始想找一个本地人当县长，有些声望的。我想到原国民党县政府的教育科长高直侯，在

仪征教育界有点名望，也比较清廉。周爱民要我去邀请他。他当时住在谢家集，我找到他谈了建立民主政府、请他当县长时，他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推却。他有国民党是正统的思想，怕共产党建政权不合法，不仅不敢当县长，连政府也不敢参加。后来他就不住谢集了。

周爱民又提出要我当县长，我坚决不同意。我认为县长必须由年长一点人当才像样，自己二十周岁才过，年纪太轻，当“县太爷”不像。1940年4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周爱民只好自己先兼县长。县政府成立了，但政府的架子还搭不起来，还得有些办事的人。我三顾茅庐，请赵新民及其子赵刚、赵毅到县政府当科员、办事员，又动员李绳武当县督学，葛许光会刻蜡纸，请他来办报纸，印绳之也被请来了。正好大别山撤出一批干部，有的也分配到县政府，石竹任政府秘书，殷特到民政科，杨可夫搞庶务，还有江声、余雷等人。县政府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

周爱民要我当文教科长兼司法科长，开始我不想做行政工作，我一心想搞武装，觉得搞武装打日本鬼子痛快，但组织决定了，我还是当了。县政府仍设在原来国民党敌后县政府所在地月塘西面的海会寺，白天在海会寺办公，晚上转移到农村去住宿。

我不懂教育，当文教科长实际没有具体管事。当时民主政府管辖范围内只有两三所小学，李绳武当过十几年的小学校长，又是督学，管教育很有经验，一切都由他去管。我虽熟读过《六法全书》，兼任司法科长时也用不上。战争时代常常有民间诉讼，都是房地产和债务纠纷。老百姓是相信政府的，经常到县政府打官司。遇到这些官司，我得耐住性子说服双方，以调解为主，向双方晓以大义，说明日军侵略，

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难保，亲邻之间应该以国难为重，不必过分计较个人私利。这样义正词严一说，大道理管小道理，也能说服不少人。但也有个别人不通事理，胡搅蛮缠，明明错了也不认输，我就用压力压服，罚他在政府厨房劳动，想通了再回家。新政府新政策，我也有我的新办法，总算勉勉强强干了几个月。

在我当文教科长兼司法科长期间，县长换了三任，先是周爱民兼任，后是五支队民运科杨汉继任，不久杨汉跑了（据说投敌叛变），又由吕惠生接任。吕惠生是安徽省无为人，是老教育工作者，在无为很有威望。他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有正义感，拥护共产党。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安徽的国民党要抓他，由我们党保护，将他接出来，到仪征当县长。他不仅有文化，而且熟悉政府公事，善于词令。一次，他召开士绅座谈会，纵论历史上民族英雄，讲外族入侵、全国人民必须团结御侮的道理，说得仪征地方的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心悦诚服，认为共产党有来头，这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都跟共产党抗日，有共产党领导不愁打不败日本鬼子。那时，抗日民主政权刚建立，人们对共产党、对民主政府不了解，不放心，吕惠生非常注重宣传工作，经常召开士绅会或较大的群众集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关政策，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从而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树立起新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吕惠生在仪征时间不长，但对仪征工作开展功劳不小，对我个人帮助也很大，我向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吕惠生后任皖江行署主任，皖江地区撤退时，遭国民党杀害，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陈列馆有他的事迹陈列，还有他充满浩然正气的诗词。他永远值得我怀念和学习。

在我当文教科长期间，第一次听到刘少奇的报告，那是1940年6月下旬，我到半塔集联防办事处参加文教会。会议期间正逢7月1日共产党建立十九周年纪念日，会议安排大家听刘少奇报告。这天，我和王昭铨一同到大田营听报告。会议由邓子恢主持，当他讲到请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做报告时，他的闽南话“胡服”我听成了“伙夫”。我好生诧异，怎么是伙夫做报告？刘少奇报告的题目是“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他上身穿整洁的白布西装衬衫，下着蓝灰色军裤，站到讲台前开口就说：“我们党已经建立十九年了”，气派非凡。在讲话中他批评华中的党没有抓住时机，没有完成发展任务。邓子恢插一句“基本上完成任务”，他随即大声批评，“基本上没有完成任务！”，邓子恢不讲了。他历数华中地区未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独立自主，放手发展，扩大武装，壮大抗日力量的方针，统战中右倾，失去了大发展的大好时机。讲到党员修养，讲到如何做一个好党员，如何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都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高深道理。这是我第一次听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受到的教益很深。

（三）

我在县政府管了三个多月文教、司法工作，觉得自己还是搞武装比较合适，因此向县委、县政府提出要求，自愿去搞武装，开辟四区。为什么提出搞武装、开辟四区？一是从个人情况出发。我从小就喜欢刀枪，读私塾时常和小伙伴们糊起纸军帽，扛上木片枪，演兵操练；十二岁时家里买了步枪，我就喜欢把枪搁起来瞄准，实弹射击，并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军人。1936年，我报名到陈集受军训三个月，从单兵制